

顾千里校本《元朝秘史》札记

关于“鲍廷博抄校”的“十五卷本”

李庆

《元朝秘史》除了顾千里所校的“十二卷”本外，文献中常被引用的还有“十五卷本”。

其一，“十五卷本”《元朝秘史》的传钞本，现存较多。

所谓“十五卷本”的《元朝秘史》，见于有关记载和著录的，有：钱大昕本、阮元本、孙星衍本、黄丕烈本、丁丙本，张蓉镜本、瞿镛本、马玉堂本等十多种（笔者主要根据已经公布的韩泰华本、即卡法罗夫所得本；陆心源本，即今存于日本静嘉堂的文本，此本日本学者原山焯有专文论述；张蓉镜本，罗恰有专文的论述；还有有关介绍文字，不赘）。

那么，这些究竟是什么文本？它们相互间是什么关系呢？

笔者认为，当根据所涉及人物的年代和所在区域适当分类，以便探讨文本的流转传承。当然，具体的关系，还需一一核对文本、加以探讨。

从这些文本涉及人员的时代顺序，大致如下：

嘉庆年间：钱大昕、阮元、孙星衍、黄丕烈本、抱经堂卢氏等。

道光咸丰年间，主要有：丁丙、韩泰华、马玉堂、张蓉镜、瞿镛等。

同治光绪年间：陆心源、郁松年等。

据有关记载和著录和资料，按地区，各种文本可大致分为四类：

其一，北京及北方地区的传本。有阮元及有关的文本，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为一部十五卷本，写有提要，这个本子是他在19世纪初任浙江巡抚和学政期间征集到的，准备进献朝廷。

莫有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谈到过：“仪征阮氏亦有抄本，谓其纪年以鼠儿、兔儿、羊儿等，不以支干。而所载元初世系，史所述始自孛端叉儿之前，尚有十一世。曾以进呈。”（见卷四“别史类”）当可靠。

马玉堂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副贡，道光二十五年赐同进士出身，与马瀛同族，藏书数量亦相近。则所收之本，为稍后传抄者（见王欣夫、徐鹏《藏书纪事诗补正》卷六，1989，632页）。马玉堂旧藏本，现藏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院信息资料室。他处未见著录。据介绍，该抄本分六册，卷首有七行识语，其后附钱大昕的“跋元秘史”。卷一题名下有“忙豁仑

纽察脱察安”八个字。每册首页题名下钤盖“马玉堂”、“笏斋”印记。马玉堂旧藏本的识语中提到“黄茺翁影元抄本”。

而《元朝秘史》流传到北方还有喀喇沁王府藏本。喀喇沁王府藏本为残本，仅保留大约两卷的内容（卷七、卷八）[以上参见乌兰《元朝秘史》（校勘本）《前言》]。

其二，主要在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文本。

有孙星衍旧藏本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分二册。孙星衍卒于1818年即嘉庆二十三年，所以当成书在1818年之前。此本卷首附钱大昕“跋元秘史”。卷一题名下有“忙豁仑纽察脱察安”八个字，“纽”为“纽”之形讹。卷四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”。和其他鲍廷博校本同，这条跋文当是鲍廷博所写（见下文），可见此本是从“鲍廷博本”转抄，或是在鲍廷博生前所录。

韩泰华本。考韩泰华，字小亭，浙江仁和人。曾官潼关道，晚年侨居金陵。道光同治间，与邵懿辰、何绍基等交往。筑“玉雨堂”，多收元人集（见《藏书纪事诗补正》卷四，362页）。

1962年，苏联学者潘克福将该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。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《元朝秘史三种》。又，据记载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张穆曾根据韩本校勘（见《连筠藜丛书》本《元朝秘史》），所以，1847年以前，此本便在韩氏家中。

有的论者云：“究其来源，据抄本所钤印记和其他一些特征，可知它曾先后为韩文绮、韩泰华祖孙收藏，鲍廷博、黄丕烈曾利用。后辗转归巴拉第。”此说值得商榷。“韩文绮”收有《元朝秘史》的抄本，当在何时？

该本有如下题识：卷四“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”，卷七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乙丑元宵刻本补写迄，通介叟记”，卷九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”，卷八开始处页眉书“元朝秘史续集卷”，卷十五结尾处页眉书“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”。卷十三至卷尾，页眉共有六处题记，分别见于第247、258、263、264、282节。

卷尾有一附页，正面写有几行文字，提到“即请录饮丈正”，文末署“复翁”。各种题记及附文等，笔记与正文同[以上参

卷数	题识	所存文本及时代
卷四	“嘉庆甲子（1804）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。”	孙星衍本（嘉庆十年到二十年间）
卷五	“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。”	陆心源本（当在同治光绪时期）
卷六	“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迄，七十八叟记。”	陆心源本
卷七	“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，通介叟记。”	韩泰华本（当在道光咸丰时期），陆心源本。
卷九	“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。七十八叟记。”	韩泰华本

见乌兰《元朝秘史》（校勘本）《前言》、双金《民俗学视野下的《蒙古秘史》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8年]

韩泰华为嘉庆以后人士，以上题识当非其自题。而书尾附页，提到“即请录饮丈正”，文末署“复翁”。各种题记及附文等当是黄丕烈的口吻。

以上题跋，“笔迹与正文同”。因此，此本当是一个传钞本。究竟是韩泰华本被鲍廷博、黄丕烈利用，还是该本是从鲍廷博本、黄丕烈所得鲍抄本传抄呢？（据有的文章介绍：陈垣先生调查，认为是鲍廷博从《永乐大典》本再用明刻本补写，转给韩泰华，转给法卡罗夫。）笔者认为，当是从鲍廷博校抄本传抄。从年代考虑，黄丕烈卒于道光五年（1825）（见江标《黄丕烈年谱》，王欣夫补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）似不可能参考此本。

其三，在浙江一带的文本。

主要有卢氏抱经堂本，和黄丕烈有关的文本，即丁丙本、陆心源本等。

卢氏《抱经楼藏书目录》记：“《元朝秘史》，十五卷，四本，抄本，不著撰人名氏。”其《四明卢氏藏书目录》著录为：“《元朝秘史》，十五卷，抄本，缺首数页，不著撰人名氏。”此本和记载中的黄丕烈本相似，卷首有缺页。或当为一个系统，或黄氏之书，曾经抱经堂，后再转出。待考。

丁丙旧藏本。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。之前曾先后为王宗炎、丁丙所收藏。字迹工整，保存完好，讹误较少。卷十三至卷尾，页眉共有八处题记，其中六条与记载中的黄丕烈本、韩泰华旧藏本、陆心源旧藏本相同，另外两条分别见于第265、272节。当和陆心源本，同出一源。

陆心源旧藏本。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。原为劳格（字季言）旧藏，清末曾一度归陆心源

所有，1907年，被陆氏后人出售给日本人，入藏静嘉堂文库。此本，日本学者原山焯有专文论说（见所撰《元朝秘史》十五卷本抄本について—陸心源旧藏本の検討》，载日本《东洋史研究》1983年第42卷，第一期）据原山焯介绍：此本分两册，缺损卷首之叶（相当于第1、2节和第3节的音译正文部分），其他部分保存良好。抄写工整，讹误明显少于韩泰华旧藏本。卷五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”，卷六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迄，七十人叟记”，卷七结尾处有题记“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，通介叟记”。卷六结尾处页眉书“刻本五卷止”，卷七开始处页眉书“刻本六卷起”，卷八开始处页眉书“刻本第七卷起”，结尾处页眉书“刻本七卷止”，卷九开始处页眉书“刻本第八卷起”，卷十三开始处页眉书“元朝秘史续集卷”，卷十五结尾处页眉书“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”。

《嘉业堂藏书志》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：“《元秘史》，十五卷，旧抄本，不著撰人名氏。……此抄本尚旧。收藏有‘泰峰所藏善本’朱文方印。”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258页）当是来自郁松年旧藏。当也是从他处抄录者。

其四，江苏常熟一带的文本。

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提到一部十五卷抄本。张金吾（1787—1829），具体不详（见莫有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四）。

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九记载有《元秘史》十五卷抄本，即瞿镛本，瞿镛旧藏本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分四册，卷首和卷尾各钤盖一处“铁琴铜剑楼”之印记。卷首附钱大昕“跋元秘史”。

张蓉镜本等。关于张蓉镜本，近年罗恰做了探讨（《张蓉镜抄本元朝秘史》考述，《民族研究》2017年第5期），指出：“鲍廷博抄本（庆

按：此指韩泰华本）与陆心源抄本所有之各种题记、附文及黄丕烈致鲍廷博短简在此抄中俱无。另人名、氏族部落名、地名亦无短线标明。行段亦间有小异。”相比“鲍廷博本”，舛误较少，有的论者介绍，此本“与孙星衍藏本、瞿镛藏本、王宗炎藏本相同”。

但从该文所列和孙星衍本的对勘情况分析，多是传抄致误（如缺少的文字中有关发音的“舌”“中”字，用俗字代替原来的繁体正字等）当是从有关文本转抄而出。陈树杓《带经堂书目》、周星诒《传忠堂书目》分别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，均说明为“张蓉镜抄本”。有关的常熟地区的传本，互相传抄的可能性较大。只是时间有先后。

分析对比以上四类各种文本，共同的特点，有如下数端：

(1) 笔者注意到，现存多数文本从卷四到卷九，大多都有“通介叟”或“七十八叟”的题识，(2) 多有所谓的“钱大昕跋”，(3) 所有这些文本题下都有了“忙豁仑纽察脱察安”八个字。也就是说和顾千里《跋》中说的钱大昕处的《永乐大典》本情况不同。

现将有关文本中所见题识，汇总列之于下。（见表格）

这里的“七十八叟”的“七十八”，当是年龄。据刘尚恒《鲍廷博年谱》，鲍廷博生于1728年（雍正六年），卒于1814年（嘉庆十九年）。嘉庆十年，用虚岁计算（中国传统的计算法）正巧七十八岁。还有，“通介”，为鲍廷博之号。

又，韩泰华本，有“复翁”贴页。中有“录饮翁”的称呼，鲍廷博，字以文，号录饮。也就是黄丕烈要请鲍廷博指正。

据以上情况，可知：

(1) 上述文本中的题识，当俱为鲍廷博所题。所以，有这些题识的文本，当源于鲍廷博在嘉庆十年抄、校的本子。或可称为“鲍廷博校抄”本的传抄本。

(2) 这些抄、校都是在嘉庆九年末到十年初三个月内完成，并且是根据残本“补抄”。

这是所谓“十五卷”本的基本情况。

那么，鲍廷博在嘉庆十年抄、校的本子源出何处？和顾千里的校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（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）